

江西文史 资料选辑

198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 四 辑

(总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目 录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	刘建华 (1)
保卫中央苏区南大门	朱开铨 (30)
回忆在彭总身边的战斗岁月	叶长庚 (40)
五次反围剿的片断回忆	李远沛 (53)
回忆工农红军学校的学习生活	欧阳平 (59)
朱德同志在石城的故事	潘德高 魏 枫 (64)
跋涉千里到红都	江西农大马列主义教研室 (69)
—— 1 9 3 1 年周恩来同志由上海奔赴江西苏区经过	
中央苏区时期统战政策的一大胜利	江西农大马列主义教研室 (77)
江西留法勤工俭学生点滴情况	熊巢生 (85)
大革命时期东乡县党的建立和斗争	乐 典 (89)
秋高东望寄乡情	石凌鹤 (182)
樟树的中药事业	清江药材公司 (100)
南浔铁路沿革史	方 达 (108)
解放前的庐山图书馆	徐效钢 (114)

南昌葆灵女中往事回忆.....	周兰清 (126)
抗战时期江西国际救济委员会概况	蔡智传 (137)
我所知道的江西的洪江会	周寒僧 (144)
百万富翁周扶九的兴衰史	梁仁道 (153)
关于赖世璜之死.....	赖盛庭 (163)
淮海魔影.....	蔡射受 (171)
(23) 靳云鹗	
(26) 平田朝	
(19) 周 麟 高潜斋	
(28) 室得尊义主既昌大亦西王	暗至怪里干恭戴
	世经刘敬西工独掩砌土由志同来恩恩平 1801——
	休想大一前策短昂矣限切习恭央中
(77) 室得尊义主既昌大亦西王	
(38) 王集鼎	
(29) 典 永	
(33) 傅泰开	
(001) 匡公林德玉南	
(201) 志 式	
(111) 顾景翁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

刘建华

赣粤边的三年（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十月）游击战争已经过去四十八年了。新中国诞生以后，我多次回到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每次故地重游，都勾起我对死难战友的深切怀念，对支援我们的根据地人民的无比崇敬，对游击区山山水水的无限留恋。三年游击战争的岁月虽然不算很长，但可歌可泣的斗争业绩，却载入了中国人民光辉的革命史册，永垂不朽！

对于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陈毅同志，杨尚奎同志，陈丕显同志，都已有详细的回忆和记载，有的著了书。特别是陈毅同志，当年在战地还留下了很多极其宝贵的诗词，形象、生动、真实，具体地描述了三年游击战争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歌颂了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高度评价了根据地人民对我们赤胆忠心的支援。那时，我很年轻，经历的斗争和知道的情况毕竟是有限的。现在尽我自己的回忆把它写出来，这是历史情况的回忆，在今天或许也还有现实意义。

赣粤边是南方八省（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浙江）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之一。主要是江西省的信丰、南康、大余、赣县、龙南、全南、定南和广东省的南雄等地区。一九三四年冬，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领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后，主力红军于十月被迫战略转移，北上长征。本来蓬勃发展的南方革命形势，自此便进入了低潮时期，剩下的各地留守部队和地方机关，开始了以游击活动为主要形式的革命斗

争。在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分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的领导下，一部分部队相继转移到以油山、帽子峰为中心的赣粤边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为了加强这个地区游击战争的领导，在主力红军长征后，赣南省委决定、经苏区中央分局批准，成立了信（信丰）、康（南康）、赣（赣县）、雄（南雄）特委和军分区，随着斗争的发展和需要，后来改为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李乐天为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杨尚奎为特委付书记，王龙光为组织部长（后动摇脱党），向湘林为军分区参谋长（后被捕叛变），李国兴为政治部主任，组建了一支五、六百人的队伍。我（那时名叫刘新潮）也随同这支部队来到赣粤边，任少共特委书记。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我们由于都县的小溪出发，经赣县的大田、长洛之间，夜渡桃江河，在王富圩与敌人打了一仗。因守敌兵力不多，不敢对我尾追。紧接着我们急行军赶到赣县的大陇，并于当晚，乘夜深人静，寥星空落，通过信、康公路，到达南康的龙回地区，第二天又穿过信、康交界的大山区，到达信、余边境的上乐村，第三天到达了离油山不远的槽里村。在那里同信康赣县委书记刘符节和朱赞珍、李绪龙等同志及当地游击队会合，并召开了军民联欢会。李乐天，杨尚奎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军民团结起来，壮大革命力量，坚持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第四天，经上下坪到达油山廖地村。到油山后，我们的部队改编为三个大队，至于武器装备，还是大家随身带来的，两挺重机枪因为太笨重，行军不便，后来埋藏起来了。此外还有几支花机枪，其余都是步枪和各种手枪。

一九三五年二月，赣南省军区参谋长龚楚带领的七十一团突围来到了油山（此人后来到湘南活动时叛变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中旬，苏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在会昌、会昌交界的仁风山区（今属于都盘古山）突围后，遇到原新划的代英县委书记曾纪才同志，由他带路，化妆来到了油山。不几天，赣南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省委书记陈丕

显带领突围剩下的八十多人的部队也来到了油山。阳春三月的油山，正是：

山高林密杜鹃笑，
游击健儿四方来；
革命开出新天地，
血水谱写新篇章。

油山，是大余县梅岭东面的一座高峰，拔海一千多公尺，地处赣粤两省，横跨信（信丰）、余（大余）、雄（南雄）三县。从雄、余边界的梅岭到信、康边界的莲花窝，长达八、九十公里，宽三、四十公里，形成一个长条的半月形地区。这里，山峦叠障，竹木丛生，站在高山之巅，俯视群峰，有如大海中起伏的绿色波涛；走进深山幽谷，到处可以看见人民世代居住在那里的点点山庄。晴天，山花争艳；雨天，云雾漫天。是一块紧靠平原、接近城市、进出方便的游击区。帽子峰又是雄、余边界的纵横数百里的大山区，群山环抱，竹木参天，由此向西，可伸延到湘南各地。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好地方，任凭敌人千军万马，闯到此地也无可奈何。

当然，选择油山、帽子峰为基地开展游击战争，也还有它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这里又有许多优越的条件。

从战略上来说，这里靠近中央苏区，是中央苏区的外围，与留在中央苏区活动的游击队联系方便。同时，以油山为中心，有向四方八面发展的广阔天地：朝东北，可以直通信丰；大余边界的上坪、下坪、雌山、莲花窝，以至还可伸到赣县的大陇；向南，越过雄、信公路，可建立信南（信丰、龙南、定南、全南）游击根据地，又可进入九连山区，和粤东、闽西南的游击队联系起来；向西，越过雄余公路，以帽子峰为中心，可以建立雄、余、崇、仁游击根据地，由此再向北挺进，可以与湘赣老苏区（井冈山地区）取得联系。这就是说，我们立足油山、北山，进可打击敌人，退可迂回自如，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在客观上造成：“讲战术，稳坐钓鱼台。敌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乖乖听安排”的局面。

再就是这里有一条勾通江西、广东两省的韶(关)、赣(州)公路，是赣粤两省的交通要道。南通粤北重镇韶关，北连赣南心脏赣州。游击队在这里频繁活动，进退自如，既威胁着赣南、粤北的反动统治，又影响着赣南、粤北的广大人民。从以上这些自然条件说明，油山和北山的战略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从进行游击战争的条件来说，这里也是十分优越的：首先，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经过了大革命的洗礼，有了较深的革命基础。早在一九二六年的时候，已经有了党的活动。一九二八年，以黄泥排大阿为中心的信丰暴动，给油山以很大震动。一九三〇年旧历三月，中共信丰县委派共产党员曾人超带领三、四十人的暴动队，从黄泥排来到新水塘，先在长安圩发动群众打土豪，接着成立长安乡苏维埃政府。继之在坑口、上乐、上坪、下坪也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到了这年冬天，长安区工农苏维埃政府成立。再说，李乐天同志早在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曾带领游击队在油山一带活动，我们来到这里以前，这里已经有了以李乐天为领导的信雄军政委员会的组织和一部分武装在这里坚持斗争。这就说明，油山具备了坚持游击战争的条件，是我们生存、发展的好地方。

其次，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带领红四军由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曾于一九三〇年的三、四月间，从南雄经中坝、九渡、禾坑打下信丰城后，派了一支红军经长安、坑口去大余，红军经过时，大写革命标语，宣传人民，教育人民，号召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废租废债，实行婚姻自由等等。进一步唤醒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为他们指明了光明前途。

第三，由于这里地处两省边界，是反动统治最薄弱的地方，虽然敌人对付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他们内部又是有矛盾的，各有各的算盘，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生存和发展。记得在一九三六年春天，信丰的敌人对我们实行大抄山，大余的驻敌偏偏按兵不动；大余之敌发起“清剿”，南雄的敌人又坐视不理。这种矛盾的状况，十分有利于我们采取灵活的战术，避敌锋芒，击其弱

点，达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正由于有了上面的有利条件，加上极优越的天然环境，我们能够以弱小的兵力，战胜七十倍于我的四万余众的强大敌人，就在这丛山峻岭中，周旋了整整三年。

二

自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到达油山以后，直到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底，在这四个月内，敌人的主要注意力是：一方面是前堵后追长征中的红军，妄图在途中一举消灭红军主力；另一方面则集中优势兵力，扫荡中央苏区，企图消灭我留守部队，并采取惨无人道的烧、杀、抢的手段镇压苏区人民。油山地区，暂时是个空隙地带，一时显得较为平静。当时我们思想上也的确有些盲目乐观情绪。那个时候，我们的作风还没有转变过来，对于一时“平静”的后面，潜伏着即将来临的敌人大规模的对我“清剿”，认识不足。特别是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又以极左的思想指挥部队，一切按正规化制度进行，集合、点名、出操都吹号，统统还是老一套，强调集中行动，在油山转来转去，没有在有利的形势下，分兵到各地去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打算和建立比较牢固的据点。

到了一九三五年的四月初，形势骤然变化。北上的红军离苏区越来越远了，在中央苏区内线的部队，垮的垮了，转移的已转移了，油山成了敌人眼中钉。敌人早就意识到，赣粤边也是他们的战略要地，如果不尽早消灭游击队，革命烽火必然要燃烧起来。所以，从此以后，敌人便摆开了一场杀气腾腾的架势，调兵遣将，兴师动众，集结兵力，全面向赣粤边游击区进攻。

为了对付我们这几百人，敌人开足了宣传机器的马力，一时吹嘘三个月消灭我们，一时又叫嚷六个月消灭我们。为此，敌人在战略、战术上做了周密的部署；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也作了紧密的配合。游击区的天空，一时黑云密布，真有泰山压顶之势。

敌人在战略部署上，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压倒我们。先以

粤敌余汉谋一个军全力以赴，主要分布在信、雄、余地区，军部设在大余县城，余汉谋亲自坐镇指挥。当时，余军下属三个师，三万余人，分别在大余驻防一个师，余汉谋自己兼师长，兵力分布在大余、南康、崇义、上犹一带，主力在大余、南康一线；另一个师的师长叫叶肇，主力驻扎在信丰各地，一部分驻三南；还有一个师分布在粤北的南雄地区，师长是李振球。后来，又增加了蒋介石嫡系的四十六师驻赣州、南康等地。加上地方上的保安团、民团、铲共团等地主武装，共有兵力四万余人。雄、余、信三县境内，顿时到处是兵，弥漫的硝烟，散发出浓烈的火药味，敌人企图把红军游击队消灭在这块红色土地上。

在战术上，敌人采用鱼鳞战术，布下了三道严密的封锁线，把信、康、余、雄四县城之间的一块四方形地区，层层封锁，全面驻兵，妄图把我们压到山区与外界隔绝，一网打尽。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能消灭的则消灭，不能消灭也要困死我们。这三道防线是：第一道是封锁沿江和所有的渡口。信丰、赣县的桃江，大余、南康的章江，这两条江的沿江两岸都派重兵驻防，以便夜间截击我渡江部队和人员；第二道封锁线是沿公路驻兵，尤其是雄信、雄余、信康三条主要公路，几乎沿途所有圩镇和较大的村庄都驻了兵，敌之团部、营部也大都分布在沿公路上，日夜巡逻和搜查过往行人，企图卡住游击队的行动；第三道封锁线是沿山区周围布防设点，做碉堡，驻兵把守。当时，信丰县之黄泥排、牛岗、禾坑、长安、中坝以及游击根据地中心的锡坑，渡寮、上坪、下坪；南康县之井里、禾高；大余县之杨柳坑、长江、小汾、留地、内良、河洞、佑坑、游仙；南雄县之横水、白云、上嵩、邓坊、大塘；油山山里之黄地、大兰、坪林、茶头背、益田等地，敌人都是以排或连为单位驻守在那里。总之，一二十里路就有一个据点。三南地区的龙南、全南等部分地方，也是类似这种情况，其目的在于发现我们的部队，就能四面合围，加以消灭。

敌人的军事部署就绪后，便开始长期的全面“清剿”。对于进

山的一切行人，严加控制，人人盘问，个个搜身；对于山区，则是不分昼夜“清剿”。白天在山上到处穿插，寻找目标，到处开枪、恐赫，狂喊“这里打死一个土匪”，那里又抓到一个活的，捕风捉影，十分嚣张；晚上，在深山路口或山垭上打伏击，或到山上看火光，听声音；此外，敌人还采用化妆的办法，佯称上山砍柴，走亲戚、问路、假装游击队叫群众做饭等等，寻找游击队的行踪。

在政治上，敌人大造反动舆论。先是在群众中进行欺骗宣传，胡说“朱毛的红军已向西跑了，这里的不是红军，是外地窜来的一股土匪，你们不要上他们的当啊！”还到处贴标语、布告，悬赏多少银元，捉拿某某。敌人的宣传，尽管蛊惑不了人心，但也有些群众确实为我们耽心，有的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走啊，国民党到处扎兵，一定要消灭你们呢！为了安全，你们避避风吧，我们的心，始终是拥护共产党的”。其次就是挑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企图在我们内部制造混乱，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现在是河东人到我们河西来当家，咱们可得小心，别上人家的当。”又说：“他们是没办法才跑到这里来的，都是毛泽东不要的人。”敌人在这里所指的河东，就是桃江以东，河东人就是中央苏区转移来的红军；河西是指桃江以西，也就是信丰、大余和三南一带的本地干部和游击队。第三个花招，就是煽动游击队自首自新，为了瓦解游击队，他们提出什么“自首自新无罪，杀了匪首有奖”。总之，敌人用尽一切办法来瓦解我们，企图最后消灭我们。

在组织上，敌人为了不让我们有活动余地，实行了严密的保甲连座法，当保甲长的又大都是一些地主、富农分子或地痞、流氓。他们挖空思想出了“五家连保”法，提出，一家出事，五家同当；一户通匪，五户同罪。”使群众互相监督，互相制约。敌人满以为这一下老表就不敢再接近游击队了；其实，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游击队与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反动派对游击队、对人民越猖狂，人民群众就越加会热爱我们；反动派越是严加控制群众，群众越会想出各种办法来支援我们。有时只要我们三天不下山，老表心里就

着急了，不是担心我们被敌人打死，就是担心被敌人抓走；一旦我们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老表就十分高兴地说：“哎呀！这几天风声紧张，我们没看到你们来，真急死人呢……”，”紧接着便是生火做饭，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如鸡蛋、小干鱼等给我们吃。敌人的另一个花招，就是搞特务活动。他们派出一些与当地群众有亲戚、朋友关系的走狗深入山区，还收买当地流氓、鸦片烟鬼，伪装砍柴混进山来打听我们的情况。但是，山里群众是有经验的，决不会上他们的当，结果还是枉费心机，敌人的这些阴谋都失败了。

在经济上，敌人想尽一切办法企图困死我们。他们知道游击队最需要的是粮食、油、盐、布匹和药材等物品。所以，第一步就是严格控制这些物品的定量，规定群众留粮，限制群众买油、买盐、买布匹，查到多采购者，便寻根究底，轻则坐牢，重则杀头。并且在油山的里里外外，张贴布告，提出所谓“通匪者杀，济匪者杀，窝匪者杀”的戒条。甚至我们抓到的土豪被他们知道了，也要向他们的家属进行威胁，不准他们来向我们交款。这些恐怖政策，当时确实笼罩着山里山外，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困难。但群众还是千方百计支援我们，觉悟了的人民是吓不倒的。

敌人另一个更加毒辣的阴谋，是移民封坑（或叫封山），制造无人区。从一九三四年（主要在信丰）到一九三六年，连续三年，年年如此。每年冬季开始，就逼着山里人民，特别是我们中心区的群众，挑着铺盖、粮食，强行赶到敌人的据点内或山外平原地区去借屋住，直到第二年的三月，才让老表进山种田。因为南方的冬季，正是秋收冬藏季节，收的已经收了，藏的也该藏了，农活基本上停止了，天气又渐渐变冷，敌人以为这下游击队在山上，要粮没粮吃，要衣没衣穿，不饿死也得冻死。可是，游击区群众仍然想尽一切办法，在迁居之前就把粮食藏在山上掩盖起来，做上记号告诉我们去取用，敌人的阴谋照样失败了。当然，由于敌人的移民封坑，给我们的压力确实是很大的，我们的粮食还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正如陈毅同志在赣南游击词中所写的：

“天将午，
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当时的情况确实如陈老总描绘的那样严重。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冬天，天气很冷，雪又很大，连小草都冻得象冰棒一样。这时正好陈毅同志来到信康赣县委与项英同志商谈当前工作，和我们住在一个棚子里。因为大雪封山，冰块粼粼，粮食已经吃完，肚子饿了，只好漫山遍野寻找野果充饥。有一种象香蕉一样的野果，叫“榔”，吃起来味道倒蛮甜。当时我和几个年轻的同志一起，爬上树去摘，陈毅同志就在树下检，领导和我们在一起，有说有笑，感到十分高兴，真是“苦中有乐”。

反动派还嫌移民封坑不够彻底，进一步对游击队的基本地区，实行三光政策。从油山边缘之上坪、下坪、槽里、黄坑口、坑口、上乐等许多村落开刀，连续烧了五、六次，片瓦不留。当这些村上的群众在第二年三月进山春种，只好用竹子、杉皮搭个草棚栖身。

敌人经过控制购买物品、移民封坑、三光政策，这些办法都不成，又生一计，便于一九三六年春，又采取大规模的抄山。这时项英同志正在信康赣县委，得悉这一紧急情况后，立即布置采取三条措施：一是游击队转到山外活动：华山游击队到信康公路一带，雌山游击队到信雄公路一带，同时发动各地游击小组配合，贴标语、散传单、破坏电线、扰乱敌人；二是动员群众用积极、消极的办法对付敌人抄山，尽可能设置障碍，破坏敌人的阴谋；三是把机关分散、隐蔽，消灭住地目标，使敌人找不到影子。这次抄山，在信丰、南康，先后强迫群众万余人，人人带柴刀、带火柴，在荷枪实弹的敌人强迫下，走在前面。强迫群众见树就砍，见草就烧，见山沟就下去搜索，而且规定群众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规定，在山上砍出一条纵横一丈宽的十字形的路，以便他们竖可以直通到山顶，横可以绕山

搜查。然而，广大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想出了不少抵抗的办法来对付敌人的阴谋。例如只听到柴刀叮当响，却不见树木倒下来，原来群众是在用刀背砍树，故意迷惑敌人；还有些群众把身上带的火柴（当时叫“洋火”），在过河沟的时候，故意跌跤，把火柴浸湿，到用起来的时候就点不燃；还有的规定暗号，或用打“呵哨”的办法，使我们知道敌人到什么地方搜山了。总之，广大群众千方百计使游击队不遭到损失。由于抄山的进展十分缓慢，天天爬山越岭，腰酸腿痛，又见不到游击队的影子；同时后院又起火了，游击队神出鬼没地到了敌人的后方，使敌人惶恐不安，本来打算抄山一星期至十天，结果只抄了三、四天，在山里吃住又困难，士兵情绪又低落，便泄气收场了。

三年来，由于敌人军事上的全力“清剿”，政治上的欺骗宣传，组织上的严密控制，经济上的长期封锁，游击队的衣食住行是非常困难的。天寒地冻最多也只发件卫生衣，一床没有棉花的夹被。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要说没有棉衣，棉被，即使有了也是个累赘。最困难的时候，是两人共发一套机动衣服，遇上天晴才轮流换洗衣服。睡觉那就更简单了，一年四季都是“天当房，地当床，打个盹儿入梦乡”。开头用竹子搭棚子，同志们风趣地把一块块竹片美其名叫“琉璃瓦”；后来因劈竹声音大，容易暴露目标，就改用杉树皮，最后发展到用布搭棚子。将二尺多宽的粗布，剪成一丈四尺长，每人一幅，几人联合搞成一个“人”字布棚，上面盖上油纸，大家就在棚底下睡觉。这种办法非常简便，收撑也快，遇到布棚也没有，就只好靠着大树，撑着雨伞，背靠背地坐着睡。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度日，基本上过着“露侵衣被夏犹寒，满身沾野草”的山林生活。尤其是冬天的山沟里，寒气袭人，冷风刺骨，我们主要是靠烧火取暖。到了天亮就把剩下的火炭，挖个坑保存起来，留着晚上做火种。吃饭是有一顿，没一顿，有时吃得饱饱的，有时又饿得眼发花。我们身居老林，却不能在大白天做饭，怕烧火冒烟，暴露目标，所以，都是头天晚上做好第二天的

饭，这样，几乎天天都是吃冷饭，喝凉水。由于敌人封锁得极严，我们常常遇到断粮的情况，于是冬天吃竹笋，夏天吃野菜，秋天摘野果，晚上捉石鸡，白天捞鱼虾，就是常有的事了。那个时候，生活虽然这样艰苦，但大家还是对胜利充满信心。特别是我们的陈老总，哪怕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还是保持他那乐天派的气慨。记得一九三五年夏天在帽子峰时，一条大蛇钻到我们棚子里来，大家群起而打之，把蛇打死了，立即煮了一锅，连汤带肉，大家很高兴吃了一顿。为此，陈毅同志挥笔把它写进了赣南游击词：

“叹缺粮，

三月内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

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当时项英、陈毅同志和大家一样苦。项英同志除了抽点烟之外，什么也没有多要，有时烟抽完了就捡纸烟头抽。零用钱是没有的。只有交通员、游击队员，有时发给一双鞋子费。此外，就是靠平日节省剩下来的伙食尾子，按人分一点，条件好的时候，每月可分块把钱，但谁也不敢花掉，留在身边准备打散了，失去联络时使用。特委在帽子峰山区的时候，有一次陈毅和杨尚奎同志派我到徐赤民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当工作团主任，有一天我们住在香蕉棚子里，被敌人发觉了，遭受袭击，结果部队被打散了。我和我的通讯员叶树林同志回到帽子峰好几天才找到特委。几天来就是靠野果充饥。在那种情况下，失去联络是常有的事。那时部队行军，工作人员来往、走路，能有羊肠小道就算很好的了，经常走的是没有路的地方，住的是没有房子的山沟里。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常常是晚上走；为了不留痕迹，常常从小河沟里走水路，行军不能打电筒，不能大声讲话，一切都是为了安全。

三年的日日夜夜，尽管敌人不停地对我们疯狂“清剿”，但还是有“松”有紧，“松”紧交错。有“清剿”的高峰时期，也有间

隙可利用的时候。但都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联系。所以在三年中，出现过三紧三“松”的情况。当然，我们说“松”，是与紧相对而言，而且“松”的后面，将出现的是更加频繁的紧张。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五年三月，是属于“松”的情况，因为敌人要全力追剿红军主力和扫荡中央苏区，一时顾不上集中兵力进攻我们，油山就显得松一点；但紧接着从四月起，进攻我们的高峰就出现了。粤敌、赣敌，正规军与地方团队，纷纷云集赣粤边，狂叫三个月消灭我们，不行又改半年消灭游击队。这一年，是全面“清剿”最高峰的一年，也是我们最困难的一年。一来是我们刚刚转过来，由苏区转到游击区，由正规制度转为打游击，由集中转到分散，立足又未稳定，各方面都还不习惯；二来敌人大于我七十倍的兵力，层层包围，全面“清剿”，企图乘我们立足未稳一举消灭掉；三是由于战术上的大变动，由正规战转到游击战，既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内部也还不十分稳定，后来，经过一段艰苦斗争，对新的形势、新的斗争生活逐步适应了，内部也稳定了，最后，敌人的全面“清剿”还是以失败而告终。第二次敌人进攻的高峰是一九三六年春开始的强迫万民大抄山。敌人先在信丰开始发动，接踵而来的南康方面积极行动，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妄想把我们消灭在山上。由于我们采取了敌进我出（到敌人后方去）和广大群众的有力支援，敌人抄山也未捞到任何东西而收场。这年的六月，由于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蒋、抗日，敌人不得不从游击区撤退。紧接着由于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倒戈拥蒋，致使陈济棠被迫下台，李、白中立。因此，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四十六师，从赣州、南康推进到信丰、大余一带，立即掀起了第三次“清剿”高峰，下决心要在余汉谋的配合下，又一次企图消灭游击队。但是，不论是敌人的三次“清剿”高峰也好，还是三次移民封坑、制造无人区也好，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以及游击队内部的坚强团结和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敌人的阴谋通通失败了。特别是后来，在我红军的抗日行动影响下，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率领的东

北军、西北军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蒋介石已经顾不上对付我们了，所以又松了一点。随后，由于爆发了“七七”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道义上来讲，蒋介石应该停止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一切军事行动；但是，由于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本性所决定，所以，暗地里又密令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当局，在和平合作之前，加紧对我们的进攻，妄图消灭我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这样，赣南国民党当局又一次加紧对我进攻，特别是在三南地区，敌人的进攻更加疯狂。因此，三南游击队不得不继续自卫反击，拖延了一段时间才把部队集中起来。

三

对于敌人的疯狂“清剿”，我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策，所以游击队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取得最后胜利。特别是一九三五年三月中旬，项英、陈毅两同志，由原代英县委书记曾纪才同志带路，辗转来到了油山，给了我们很大鼓舞和力量，也是三年游击战争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我只听过项英、陈毅的名字，从未见过面，这次在油山是第一次见面。当时项英化名叫老周，陈毅同志叫大老刘。尤其是陈毅同志，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感到他性格豪爽，分析事物准确果断，有魄力。他到油山以后，发现部队还是集中在一起，作风还是老一套，就批评我们说，苏区都完啦，你们还在大摇大摆地唱高调，这样下去不行，要改变作风。接着我们就在南雄大岭下的一个小村子里召开了一次特委、军分区和部队中的领导干部会议，首先向项英、陈毅同志汇报了我们到油山后的几个月工作情况，然后讨论其它问题。那次会上，项英、陈毅同志一方面鼓励了我们安全来到了油山，保存了力量，并开始部署新的斗争任务。同时，也语重心长地批评了我们的缺点，指出部队不能老一套，不能搞大部队行动，要分散成小分队活动；机关也不能庞大，要缩小；作风要迅速转变，尽快适应新的斗争环境。针对敌人全面向我“清